



水滸爭鳴

第三輯

湖北省「水滸」研究會
「水滸爭鳴」編委會

主編

水滸爭鳴

第三輯

湖北省「水滸」研究會
——水滸爭鳴——編委會

主

編

水 浒 争 鸣

第 三 辑

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主编
《水浒争鸣》编委会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印张 1插页 396,000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

统一书号：10107·314 定价：1.59元

《水浒争鸣》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成生	马蹄疾	刘世德	刘冬	刘操南	吕致远
张文勋	*张国光	张澄寰	李永祜	李茂肃	*李悔吾
吴丈蜀	吴志达	*陈流沙	陈熙中	周中明	胡天风
徐放	聂铁钢	袁世硕	黄霖	*黄清泉	黄瑞云
*程一中	喻朝纲	彭骏	傅隆基	鲁德才	葛楚英
蒋松源	廖仲安	霍松林	(有*号者为常务编委)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季思 孙楷第 吴组缃 吴晓铃 吴有恒 胡国瑞 赵景深
顾学颉 程千帆

（岳宗周供稿）



水泊梁山

（岳宗周供稿）

舒 同 题字

李逵塑像

(岳宗周供稿)



目 录

重视《水浒》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	李永祜 (1)
《水浒》是指导农民战争的兵书	王利器 (11)
《忠义水浒传》序	香港中文大学孙述宇 (20)
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水浒》主题辨	蒋松源 (48)
《水浒》三题	李孝堂 (56)
《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喻朝纲 (70)
试论《水浒》“招安”问题	吕致远 (83)
评所谓“《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石钟扬 (97)
建立和扩大《水浒学》的研究	郭兴良 (108)
《水浒》故事在南北两地流传的情况	吕乃岩 (119)
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概况、序文和标目	
——《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	刘世德 (134)
《水浒传》版本考——关于《文杏堂批评水浒传三十卷本》	
日本天理大学 大内田三郎著	(163)
彭修艮译	

呼吁研究简本《水浒》意见书

- 美国夏威夷大学 马幼垣 (183)
- 《水浒传》流变四章..... 闻 莺 (205)
- 论《水浒》的简本系统..... 高明阁 (222)
- 从明初的“水浒戏”看《水浒传》祖本的成书年代
..... 王永健 (233)
- 从《信牌档》中《水浒》残本的发现, 看明末
《水浒》的传入辽东及女真地区
..... 铁玉钦 (242)
- 袁刊本《水浒》李评确出李贽之手辨
——兼评《〈容本〉李评为叶昼伪作说质疑》
..... 欧阳代发 (251)
- 元代之后的水浒戏..... 香港大学 刘靖之 (263)
- 《水浒》译本两种序..... 于淑杰译 (281)
- 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
..... 傅隆基 (284)
- 《水浒》研究中的辩证法——对《评“两种〈水浒〉、
两个宋江”说》一文的答辩
..... 张国光 (302)
- “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质疑
..... 殷 杰 (321)
- 一种《水浒》, 一个宋江
——我对鲁迅评《水浒》观点的一点体会..... 张化男 (330)
- 对“双两说”之我见..... 翁柏年 (336)
- 论宋江的多重思想性格及其形成原因
..... 叶舒宪 (345)
- 一个农民革命斗争领袖的悲剧——评晁盖
..... 杨海中 胡世厚 (363)

论梁山义军中的智多星吴用

..... 孙永都 (376)

试论武松..... 黄海胜 (387)

论林冲的性格转化描写..... 周书文 (397)

从杨志的形象谈《水浒》所反映的民族思想

..... 朱泽吉 (406)

漫谈《水浒》里的妇女形象

..... 孙寿玮 (417)

金圣叹论人物塑造中的艺术思维

..... 王先需 (426)

论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兼评何满子先生对金
圣叹的全盘否定态度

..... 刘宏彬 (440)

释“削忠义而仍《水浒》”——兼论龚兆吉先生如
何曲解金圣叹

..... 功 荣 (449)

金圣叹论小说的情节构成、变化的特征

..... 李 骞 (464)

金本《水浒》序之真谛——驳“金本《水浒》序文
为反面教材”说

..... 关贤柱 (470)

论《水浒》的武打技击

..... 王资鑫 (479)

《水浒》武技漫笔(二)

..... 流 沙 (490)

重视《水浒》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

李永祜

《水浒》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在学术界本来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看法一出，情况大变。不但《水浒》整部作品被完全否定，就连反贪官本身也遭到了贬低。贬低到几乎成了对它的消极性的一种讽刺。时至今日，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来否定《水浒》的人已经很少，但对《水浒》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估价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当前，对《水浒》主题思想的说法有近十种之多，但几乎很少把它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概括进去便是明显的例证。《水浒》对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的广度、深度究竟怎样？是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水浒》对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在它的总的思想倾向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分量和地位？看来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对正确评价《水浒》不是没有裨益的。下面仅就管见所及，谈一些看法。

所谓《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主要由地主、官僚、皇帝组成，他们结合为一个整体，对全社会实行统治。通观《水浒》全书的具体描写可以看出，作品绝不只是反对统治阶级中哪一部分人，而是对地主豪强、贪官污吏、皇帝本人，以及依附于这个阶级的吸血鬼、寄生虫等种种黑暗势力，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地主的形象在《水浒》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水浒》不仅塑造了一大批地主的形象，重要的是它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揭露了地主阶级的本质。在作者的笔下，地主毛大公父子的巧取豪夺的卑劣灵魂和毒辣手段，土豪恶霸西门庆淫人妇女、害死人命的罪恶行径，独霸一方的地主武装集团祝太公父子和曾长者父子仇视农民起义军的嚣张气焰……等，无一不跃然纸上，活脱如见。这难道不是对地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么？值得注意的是，《水浒》在自己的艺术描写中，不仅对地主豪强运用了“批判的武器”，诛其内心，揭其嘴脸，而且还让他们接受了“武器的批判”，——让他们在起义英雄的复仇斗争中和起义军的无敌威力面前，一个个斩头沥血，得到了应得的惩罚。还有什么批判比这种批判更激烈、更彻底呢？当然，《水浒》批判地主阶级的笔墨，要少于作品中其他批判部分，但这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古典文学中那些被肯定对地主阶级的罪行有所揭露和批判的作品，有哪一部，哪一篇超过了《水浒》呢？《水浒》既谴责、鞭挞了罪恶昭彰的地主，也描写了一些乐善好施、面目和善的地主，这种矛盾现象也不难理解，正如古代人民把封建官吏分为清官、贪官、好官、坏官一样，这是历史的局限的反映，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水浒》的反贪官是被普遍承认的，但在一个时期中，又是被大大贬低了其进步意义的。说《水浒》只反贪官当然是不对的，但《水浒》反贪官的确比较突出。作品给人们描写出，在宋徽宗一朝，从朝廷中枢的高俅、蔡京、童贯，到地方上的梁中书、高廉、蔡九、张都监、慕容彦达，直到基层的县官、管营、差拨、厢官等等，简直是贪官成群，污吏遍地。他们专横残暴，阴险狠毒，滥刮民财，谋人妻室，犯下了一桩桩罪行，制造了一幕幕悲剧。作者怀着强烈愤慨的感情，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他们的活动，对这伙贪官暴吏作了诛心砭骨的揭露、批判。

怎样评价《水浒》对贪官的揭露、批判呢？有的同志总认为反贪官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只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因而对包括《水浒》在内的反贪官予以否定。有的同志则把《水浒》的反贪官硬纳入忠与奸斗争的框子，断定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实际上是取消了《水浒》反贪官的进步意义。这些形而上学的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贪官暴吏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当权者，他们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地主阶级更为严重。他们是统治阶级中最腐朽、最反动的部分，历来为人民所痛恨。反贪官是封建社会人民的普遍要求。作为口号，它受到人民欢迎；作为行动，它受到人民拥护。《水浒》第六十五回扬子江边一贫苦老丈对张顺所说的向往梁山起义军“救贫济老”，和铲除滥官污吏的那番话，就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民的心情愿望。自我国封建社会中期以来，许多农民起义都把声讨贪官暴吏作为宣传鼓动的内容之一，都把贪官暴吏作为打击的重点。甚至直到近代无产阶级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都仍然响彻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这些都说明反贪官是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一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是的，反贪官的斗争一般来说对封建的政治、经济触动不大，不能与推翻一个王朝的革命风暴相比。但是绝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以后者来否定前者的合理性。因为谁都知道，即使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王朝，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充其量只不过是封建统治秩序有巨大、强烈的打击罢了。怎么能绝对化地把两者的性质区分为一是革命，一是改良呢？从《水浒》这部作品本身来看，它对贪官暴吏的批判也必须予以充分肯定。《水浒》中的贪官并不是与人民的苦难不发生直接联系的单纯的朝中奸佞。除蔡京、童贯等少数人缺乏害民罪行的具体描写外，自高球而下的众多的官吏，几乎都是残害百姓的蝥贼，吮吮民血的蠹虫。他们与自己的对立面并不是什么忠与奸的斗

争。林冲、杨志、武松并不是因为忠于皇帝而受到高俅、张都监等贪官的排挤和陷害；慕容彦达、高廉等贪官也并非因为不忠于皇帝而被梁山起义军所铲除。他们之间是正义与残暴、迫害与反迫害，起义与反起义的矛盾斗争，这难道不是明白的事实吗？《水浒》描写反贪官斗争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不是把被压迫、被凌辱的人描写成只知仰望天子的势剑金牌，依靠青天大老爷作主，一味哀求和泣诉的弱者。在作者笔下，他们无不是在紧要的关头挺身而出，与贪官暴吏展开生死的搏斗。即使象林冲那样一度心存幻想的人，也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提高了认识，夺取了使贪官暴吏伏尸流血的胜利。反对贪官不是反一个而是一群；报仇雪恨不是等待统治者恩赐，而是依靠自身和集体的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打击的不仅是贪官本身，而是官府对人民的统治。《水浒》反贪官的这个特点及其进步性质，是它之后许多有反贪官内容的小说、戏曲不能比拟的。鲁迅先生在几十年前就深刻地指出：《水浒》“意在反抗政府”。这是对《水浒》反贪官斗争的精神实质的正确评价，《水浒》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水浒》不仅揭露、批判了地主豪强、贪官暴吏，而且还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本人，这在它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倾向中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水浒》对皇帝的态度是被指责最多的问题，也是整部作品被否定的主要根据，因此有必要多花点笔墨作些分析。首先，需要搞清楚“反皇帝”的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所谓“反皇帝”有三层意思：一是从根本上反对皇帝制度，二是推翻某个皇帝的统治，三是对皇帝进行揭露、批判。就《水浒》这部作品来说，如果对它提出反对皇帝制度的要求那是荒谬的。推翻皇帝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解决的任务。若对生活在五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的作家提出这种要求，显然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如果对《水浒》提出推翻宋徽宗的统治的要求，那也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一种苛求。

谁都知道,《水浒》是以宋徽宗这一特定的朝代为历史背景的小说。历史上的宋徽宗与其儿子宋钦宗王朝是被金人的军队所推翻,父子两代皇帝也都做了金人的俘虏,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文学创作当然容许虚构,但虚构绝不能违背基本的生活真实。如果《水浒》的作者竟然描写宋徽宗王朝被梁山起义军所推翻,那就不是什么艺术虚构,而是对历史基本事实的歪曲、作者自己的思想通不过,人民群众肯定更不能接受。此其一。其二,关于《水浒》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公认为在元、明之际。而元、明之际恰恰是统治阶级对亵渎帝王悬为厉禁的时期。元代法律规定,凡“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①,又规定,凡“妄撰词曲”“犯上恶言者”为“大恶”,罪应“处死”。^②明代建国之后就更为严酷。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永乐皇帝不但不容许“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的文艺作品的制作,不但明令已有的这种作品,要“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而且更进一步规定“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③。朱元璋甚至对距他千年之前的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番话也极为不满。认为是亵渎君主的言论,竟下令将孟子驱逐出历代帝王圣贤“配享”的行列,敢有谏阻者“以大不敬”论罪^④。至于朱元璋因一字一句之讳,大兴文字狱,杀戮知识分子的事实,更是层出不穷,令人怵目惊心。试想,在元末明初这样残酷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下,有哪一个文人敢于以身试法,公然写出打倒皇帝的作品呢?即令居然有这样的作品,

① 《元史·刑法志》三。

② 《元史·刑法志》四。

③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大明律讲解》卷二十六,《刑律杂犯》。

④ 《明史·钱唐传》。

能够流传于后世吗？可见，如对《水浒》提出打倒皇帝的要求，也确实脱离实际的，不合情理的。当然，如果要求《水浒》对皇帝进行揭露、批判，这是合理的，恰当的，而《水浒》已经这样做了，并且做得出色。

翻开《水浒》就可以看到，作品在开篇之初和后半部分，都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徽宗的形象，从爱好、品德、作风、政事等许多方面对他作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作品在开篇伊始宋徽宗一出场时就写道：

这端王（宋徽宗做皇帝前被封为端王——引者注）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这一段叙述虽然比较概念化，但却十分重要。因为它写出了端王沉溺歌舞、轻浮不端的品性和作风，说明他不符封建传统观念确定的帝王的标准，为这位即将登基的皇帝的形象确定了基调。在作了这番介绍之后，作品通过重用高俅和私行妓馆嫖玩李师师这两个典型情节，塑造宋徽宗的形象，使这个浮浪皇帝离开概念化的介绍，变成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人物。高俅本是一个有着恶行劣迹，为父亲所唾弃、为地方人民所不容的帮闲无赖。但就是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卖弄了一番，顿时就被宋徽宗一眼看中，要在身边。徽宗一就帝位，竟然不到半年之间，把他一直抬举到做了掌管朝廷军事大权的殿帅府太尉之职。高俅一得势，立即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他先是打击报复，逼走了禁军教头王进，紧接着又纵容、支持干儿子高衙内图谋霸占林冲的妻子，害得林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宋徽宗作为临朝执政的皇帝，不是按照传统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不是提拔重用

贤良方正的人士，而是提拔重用高俅这样的帮闲无赖。作品在高俅和宋徽宗出场时，对他们的品行、作风都先作了类似的介绍，在他们相见之后，又描写出彼此气味相投，难舍难分。这就使人感到，高俅其实是被当作宋徽宗的替身和影子。写高俅，就是在写宋徽宗。所以，重用高俅的这个典型情节，是宋徽宗的一幅绝妙的画像，它对宋徽宗爱好、品性上的乖谬，政事上的昏庸，作出了尖锐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作者似乎感到只有这番描写还不足，又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加写了徽宗私行妓院的另一典型情节。宋徽宗贵为皇帝，身居万乘之尊，三宫六院无数美女还不足以满足其淫欲，又热恋着“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的京师名妓李师师。为此他从皇宫到妓院修了专用地下暗道。每次“从地道中径到李师师家后门来”。见到李师师后，又是要她脱去整装外衣，露出艳服，又是要她专唱“艳曲消闷”，真是丑态毕露。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特地点明，是宋徽宗自己下令要在元宵佳节张灯结彩，“与民同乐”的，但也就是他自己恰恰在元宵之夜，悄悄从地道溜到妓院与李师师鬼混。这个典型情节，无情地撕破了笼罩在皇帝脸上的神圣、威严的面纱，暴露出他象一般市井淫荡子弟一样，有着一副庸俗的嘴脸和一颗卑污的灵魂。有的同志认为：

“作者完全以赞赏的笔触写了赵（佶）与李（师师）的关系”，只不过把他写成风流天子而已，并没有反皇帝的意味，并举《游龙戏凤》的流行作为例证^①。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在古代传统的观念中，帝王、尊者，耽情于声色狗马之类，被认为是极不光彩的事情。例如《三国志》中本来记载刘备的思想作风有“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的字句，但到《三国演义》的修订者毛宗岗手里，为了尊崇刘备，对这些话概不收入。这就是很好的例证。《水浒》的作者如果真是以“赞赏的笔触”写赵、李的关

① 《谈〈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

系，他为什么要写宋徽宗改换打扮，人不知，鬼不觉，悄悄地钻地道、走后门到妓院去，而不写成宋徽宗吉服盛装，大摆仪仗，在万民景仰的隆重气氛中圣驾光临呢？作者为什么又要写当李逵大闹妓院时，宋徽宗竟吓得“一道烟走了”呢？作者对徽宗嫖妓的亵渎、针砭之情不是非常明显吗？至于描写皇帝与民女调情的《游龙戏凤》，这是在传统观念已经淡薄的近代才编演流行的，并不能说明问题。《水浒》对宋徽宗的批判，还表现在描写他对梁山起义军的处理上。宋徽宗宠信高俅、蔡京、童贯等奸佞，忽而接受他们的主意，同意招安梁山起义军；忽而又听信他们的鬼话，推翻前议。他诏命梁山起义军前往征辽，但当梁山义军奋力血战，辽邦将要颠覆时，他又突然同意与辽邦罢战媾和。他需要宋江等出力卖命时，当面许愿：“卿等勿辞劳苦，早奏凯歌而回，朕当优擢。”但在梁山起义军付出了“十损其八”的惨重代价，“破辽平寇，东征西讨”，立下了奇功大勋以后，他却又一再听信奸佞的谗言，自食其言。最后竟然背信弃义纵容奸臣将宋江、卢俊义活活毒死。笔者在《评〈水浒〉招安结局的思想倾向》一文^①中曾指出：《水浒》作者把起义军写成悲剧结局，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特别是描写宋江被害惨死时，让宋江仍说什么“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话，其最终目的不在于塑造宋江的忠良的形象，而是要以忠良“作话头”即借题发挥，用鲜血淋漓的事实，对以宋徽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残害忠良、屈杀功臣的罪行进行血泪控诉。总之，作品从爱好、品性、作风、政事等多层次、多方面把宋徽宗描绘成是一个歌舞游荡，征逐女色，重用奸佞，听信谗言，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昏庸不堪的皇帝，能说这对他不是揭露、批判吗？诚然，作品中也对宋徽宗写了一些“至圣至明”之类的褒扬之词，并且也没有把

① 首见《水浒》讨论会论文，见《水浒争鸣》第二辑。